创业活动、产业结构升级与县域经济发展

——基于广西县域数据的实证分析

赵 昱，杨羽茜

（桂林理工大学商学院，桂林 541004）

摘要：创业活动作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动力，对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但其在相对滞后地区的带动机制与实现路径仍需深入研究。基于此，以2014—2022年广西85个县域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创业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创业活动能显著促进广西县域经济发展，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在二者间扮演重要中介角色。此外，创业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对北部湾经济区县域推动作用更显著。基于结论，从政府支持、创业主体和县域发展层面提出政策启示，为优化广西县域创业环境、推动产业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创业活动；县域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06－0161－07

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1]。当前，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激发县域内生增长动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一项重要的现实议题。在此背景下，创业活动作为集聚生产要素、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引擎，其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日益凸显[2]。

然而，创业活动的影响并非孤立存在，其效益的发挥深度依赖于特定的地域经济环境、资源禀赋与政策体系[3]。县域作为联结农村与城市的纽带，县域创业活动必须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或者优势产业，才可能提高成功率[4]。广西作为西部地区，其县域经济发展既拥有独特的区位、资源和政策优势，也面临产业基础薄弱、人才和资金匮乏等挑战。因此，深入研究创业活动在广西这一特定情境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与实效，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具有明显的现实紧迫性。基于广西县域层面的数据，通过对创业活动与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等核心经济指标进行关联分析，试图回答以下关键问题：创业活动是否显著促进了广西县域经济发展？其影响路径和机制是什么？不同地区的创业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拓展了创业经济效应在特定区域层面的研究维度。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国家或省域层面[5-6]，本研究聚焦于广西县域这一相对微观的地理单元，探索创业活动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联，以期为创业理论在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与丰富提供新的实证探讨空间。②不仅关注创业与经济增长的直接关联，更试图挖掘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可能扮演的传导角色，进而为深化理解创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提供更多分析视角。③尝试关注创业效应的区域差异特征，探讨创业政策制定中“一刀切”问题的合理性，为结合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理论与实证层面的讨论方向[7]。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创业活动与县域经济发展

创业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更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载体[8]。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创新的本质是实施新组合，通过引入新产品、开辟新市场、应用新技术等方式，打破经济循环的静态均衡，创造性地破坏旧有经济结

收稿日期：2025-10-08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2024GXNSFAA010001)

作者简介：赵昱(1982—)，男，广西玉林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及管理；杨羽茜(2001—)，女，四川乐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经济及管理。

构，从而驱动经济发展[9]；从内生增长理论视角来看，创业活动作为知识溢出、技术创新与资源重组的重要载体，能够直接为县域经济增长注入核心动能[10]。与此同时，创业活动创造的就业岗位能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有效缓解劳动力外流问题[11]，初创企业不仅可通过这一效应提升经济效益、创造财富，还能促进经济与生态协同的可持续发展[12]。再者，创业活动往往伴随着新的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的出现，能够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拓展消费市场，拉动内需增长，进而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创业活动对广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创业活动数量越多，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1.2 创业活动与产业结构升级

创业的知识溢出理论旨在揭示和解释创建新企业的创业过程[13]。新创企业，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技术与新管理模式，打破原有产业的技术路径依赖与市场均衡，产生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14]。这种效应不仅促使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模仿与流程再造提升生产效率，更催生新兴产业的萌芽与发展，从而推动产业体系从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演进。创业活动在地理空间上往往呈现集聚态势，形成创新集聚效应。当大量创业企业，特别是处于同一或关联产业领域的企业在特定区域集聚时，会通过竞争与合作加速迭代，最终形成产业集群。近年来，以数字创业和绿色创业为代表的前沿形态，正成为驱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的重要引擎。数字创业通过将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一方面赋能传统产业优化流程、提升附加值；另一方面建立科技园区、数字化产业集聚区等新业态，直接推动产业体系向数字经济主导的高级形态演进[15]。绿色创业则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通过绿色技术创新重构产业价值体系，既推动传统高耗能产业进行绿色化改造，也直接培育和壮大环保、新能源等绿色新兴产业，从而构建起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结构[16]。

1.3 创业活动、产业结构升级与县域经济发展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基础，县域经济应围绕特色产业，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链、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17]。企业作为产业发展的主体，其行为转变构成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基础，而创业活动更可能成为抢占新增长点、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突破口[18]。研究表明，创新型创业不仅可提高经济增速，还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19-20]。产业结构升级既体现为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演进，也包含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壮大的双重过程[21]。创业活动的动态变化反映区域经济活力，也预示未来经济结构的演变方向。当产业结构实现优化升级后，资源得以更高效配置，要素利用效率提升，从而推动县域经济增长。因此，创业活动很可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对广西县域经济产生间接推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产业结构升级在创业活动推动广西县域经济增长中发挥中介作用。创业活动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广西各市县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由于部分县域存在关键变量数据缺失过多、统计口径不一致等问题，为保证样本完整性与可比性，从广西自治全区111个县级行政区中剔除数据缺失率超过30%的26个县域，最终选取85个县域作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14—2022年。对于个别年份存在的少量缺失数据（总缺失率低于5%），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合理补充。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GDPP）。参考王修华等[22]的做法，将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其优势在于消除了人口规模的影响，更能反映个体的平均福利和生活水平。

2.2.2 解释变量

初创企业的注册能够反映企业从无到有的初创性，有效衡量地区创业活动[5]。参考林嵩等[5]、白俊红等[23]的做法，从天眼查等数据库中查询2014—2022年每个县域新注册企业的信息，将其整合到县域层面，并采用每百人新创企业的数量（Entre）来衡量。

2.2.3 中介变量

选取产业结构升级（Ind）作为中介变量，参考黄祖辉等[24]、董旭等[25]的做法，以第二、三产业的产值之和占GDP的比例作为衡量，该指标反映县域经济由传统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的趋势。

2.2.4 控制变量

参考林嵩等[5]、陈钰莹[26]的做法，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教育水平（Lnedu），选取普通中学在校学

生人数的对数进行衡量;社会福利水平(Lnwel),采用各种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床位数的对数进行测算;金融水平(Fin),采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地区 GDP 的比值控制;基础建设水平(Mile),使用每万人公路里程测度基础建设水平;消费水平(Con),选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地区 GDP 的比例进行衡量;政府支持水平(Gov),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地区 GDP 的比例进行衡量。

2.3　模型构建

2.3.1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为了检验创业活动对广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即验证 H1,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GDPP_{it} = \alpha_0 + \alpha_1 Entre_{it} + \alpha_k Controls_{k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i 为县域;t 为年份;$GDPP_{it}$ 为被解释变量,即县域 i 在年份 t 的经济发展水平指标;$Entre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县域 i 在年份 t 的每百人创业活动数量;$Controls_{k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_i 为县域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县域个体特征;λ_t 为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控制随时间变化的共同冲击;ε_{it} 为随机扰动项;α_0 为常数项;α_1 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α_k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若 α_1 显著为正,则 H1 得到验证。

2.3.2　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检验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即验证 H2,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27]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在模型(1)的基础上构建以下模型。

$$M_{it} = \beta_0 + \beta_1 Entre_{it} + \beta_k Controls_{k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GDPP_{it} = \gamma_0 + \gamma_1 Entre_{it} + \gamma_2 M_{it} + \gamma_k Controls_{k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式中:M_{it} 为产业结构;β_1、γ_1 为待估计的系数。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了避免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干扰,进行了各变量之间的 VIF 检验。结果表明,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 VIF 最大为 1.69,不超过 10,平均值为 1.41,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核心变量中,人均 GDP 的均值为 3.411,标准差是 1.756,表明不同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最小值为 0.669,最大值为 13.708,极差显著,这符合广西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创业活动的均值为 0.538,标准差为 0.313。通过对比两者的标准差可以发现,二者在样本期内均存在可观的变化,这为后续回归分析中检验二者关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DPP	765	3.411	1.756	0.669	13.708
Entre	765	0.538	0.313	0.096	3.019
Ind	765	0.754	0.098	0.479	0.992
lnedu	765	9.900	0.780	6.909	11.758
lnwel	765	6.269	1.025	2.485	9.653
Fin	765	0.809	0.349	0.032	3.053
Mile	765	37.779	23.878	2.000	238.571
Con	765	0.289	0.181	0.043	3.878
Gov	765	0.300	0.192	0.014	1.265

3.2　基准回归

为了验证创业活动能否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该模型同时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与县域固定效应,以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偏差。表 2 列(1)首先报告了创业活动(Entre)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简单回归结果,结果显示,Entre 的系数为 0.658,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印证了创业活动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统计联系。列(2)报告了加入控制变量后,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GDPP	GDPP
Entre	0.658***	0.708***
	(3.468)	(4.060)
lnedu		−0.351***
		(−3.521)
lnwel		−0.038
		(−1.224)
Fin		−0.706***
		(−6.602)
Mile		0.002
		(0.587)
Con		−0.588***
		(−3.978)
Gov		−2.054***
		(−5.195)
常数项	2.518***	7.305***
	(29.992)	(7.461)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观测值	765	765
R^2	0.434	0.535

注:***、**、* 分别表示 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核心解释变量Entre的估计系数为0.708，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该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一致，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创业活动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H1成立。

3.3　稳健性检验

3.3.1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首先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再检验。尽管基准回归中采用的人均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常用指标，但为确保结论不依赖于某一特定测度方法，借鉴王修华等[22]进一步采用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列(1)所示，Entre的系数为0.287，且在1%的水平上保持统计显著，其符号正与基准回归结果完全一致。

3.3.2　缩尾处理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受到极端值的过度影响，参考邓金钱和列明霞[6]的做法，对模型中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以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如表3列(2)所示，在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水平的缩尾处理后，核心解释变量Entre的系数为0.556，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其系数的符号、显著性水平与基准模型相比均未发生本质变化，且系数大小保持了良好的稳定性。

3.3.3　调整样本范围

借鉴王修华等[22]的做法，由于少数民族县在政策扶持力度、文化传统、产业结构以及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方面可能与普通县市存在系统性差异，如融水(苗族)、三江(侗族)、金秀(瑶族)、罗城(仫佬族)、环江(毛南族)。这些县以单一民族文化为主导，文化特征鲜明。另外如龙胜、隆林，其名称即为各族自治县。境内生活着苗、瑶、侗、壮、彝、等多个民族，文化更多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因此，剔除样本中的12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后再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列(3)所示，在调整研究样本的范围后，基准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3.3.4　降低外部冲击

参考高静等[21]的做法，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为了降低这一外部冲击干扰，剔除2020年、2021年数据后进行回归。表3列(4)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证实了创业活动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正常经济时期同样稳健存在，也有效缓解了因短期异常波动导致估计结果不可靠的疑虑，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2) 缩尾处理	(3) 调整样本范围	(4) 降低外部冲击
Entre	0.287*** (4.253)	0.556*** (3.180)	0.715*** (3.699)	0.543*** (2.830)
常数项	2.641*** (6.970)	8.027*** (8.287)	7.456*** (7.077)	6.306*** (5.10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765	765	657	595
R^2	0.584	0.597	0.508	0.553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3.4　内生性检验

借助姚利好等[28]、高名姿等[29]工具变量的构造思路，采用各县域所在省域的其他县域创业活动平均值(Ave_Entre)作为工具变量。这是因为创业活动的发展具有网络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邻近县域的创业活动会对本县域创业活动的发展产生影响，满足相关性，但个体县域的经济增长水平与整体的创业活动水平均值相关度并不高，符合外生性条件。因此，选择最小二乘法进行重新估计，第一阶段回归结果F为36 052.24＞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表4列(2)]，创业活动对县域经济影响系数为0.684 1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上文基准回归方向保持一致。

3.5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验证创业活动是否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产生作用，选取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示，创业活

表4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Entre	(2) GDPP
Ave_Entre	−82.409 6*** (−189.87)	
Entre		0.684 1*** (4.17)
常数项	22.256 9*** (182.70)	8.811 4*** (9.13)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观测值	765	765
R^2	0.982	0.911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GDPP	Ind	GDPP
Entre	0.708***	0.028***	0.592***
	(4.060)	(2.584)	(3.495)
lnedu	−0.351***	0.003	−0.365***
	(−3.521)	(0.549)	(−3.784)
Ind			4.066***
			(6.834)
常数项	7.305***	0.799***	4.055***
	(7.461)	(12.947)	(3.82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765	765	765
R^2	0.535	0.272	0.566

注：***、**、*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

动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总效应显著为正。列(2)的结果显示，创业活动对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创业活动的发展显著激发了产业结构升级，中介机制的第一条路径成立。列(3)在模型中同时引入了核心变量和中介变量，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显著为正，同时，创业活动的直接效应系数与总效应相比有所下降。因此，H2 成立。

3.6　异质性

基准回归揭示了创业活动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平均促进效应。然而，广西内部不同区域在战略定位、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创业活动的经济绩效呈现异质性。依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广西区域的划分框架，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三大区域，即北部湾经济区（含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市所属县域）、西江经济带（含柳州、桂林、梧州、玉林、贵港、贺州、来宾等市所属县域）、桂西资源富集区（含百色、河池、崇左等市所属县域），并针对三大区域分别开展回归分析，以此检验创业活动对经济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

结果如表 6 所示，北部湾经济区创业活动的经济绩效最为显著，促进作用最强。这得益于其作为国家战略重点开发区域的独特优势，新增创业企业更易与港口经济、跨境贸易等外向型产业融合，高度开放的定位和成熟的产业基础，为创业企业提供了广阔市场、完善产业链配套与便捷进出口通道。西江经济带创业活动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反映该区域新增创业企业多为小微企业，且柳州、桂林对

表 6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北部湾经济区	西江经济带	桂西资源富集区
Entre	1.733***	−0.137	1.189***
	(5.890)	(−0.446)	(5.542)
常数项	7.954***	8.687***	3.991***
	(3.640)	(6.644)	(2.8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县域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108	387	270
R^2	0.712	0.508	0.831

周边县域创新要素产生虹吸效应，导致周边县域创业数量少；同时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偏重，新增创业企业若未与汽车、机械制造等主导产业形成有效配套协同，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便相对有限。桂西资源富集区创业活动同样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相较于产业体系成熟的西江经济带，桂西工业和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水平较低，新创企业直接瞄准当地特色资源（如百色特色农产品与有色金属、河池桑蚕与旅游、崇左蔗糖与边贸），推动资源从初级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商品。且桂西是国家和广西扶持政策重点倾斜区域，政策资金为基础设施、产业孵化、创业补贴提供支持，降低了创业门槛与风险，增加了创业数量。

4　结论与启示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创业活动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创业活动的增强能够显著推动广西县域经济发展，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创业活动不仅对经济增长存在直接效应，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间接赋能广西县域经济；创业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尤其在北部湾经济区表现得更为显著。然而，本文尚未进一步区分创业类型，如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带来的差异化影响，同时也需关注创业质量而非仅仅数量。因此，未来研究可结合广西县域创业特征，对创业活动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并构建包含创新能力、就业贡献、成长潜力等多维度的创业质量评价体系，以深化对创业活动影响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微观机制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政府支持层面：实施区域靶向补贴，北部湾经济区重点补贴跨境电商、临港制造类创业项目，引入外贸服务平台与国际物流企业；西江经济带对机

械制造创业项目给予补贴，搭建产业协同创业平台，对接柳州、桂林的科研机构；桂西资源富集区重点补贴绿色农业创业项目，打造特色农产业创业园区。

创业主体层面：引导创业企业融入本地主导产业链，北部湾创业企业对接临港石化、电子信息产业；西江创业企业参与汽车、机械制造配套；桂西创业企业围绕特色农产品打造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如百色芒果创业项目开发果干、果酱等深加工产品，河池桑蚕创业项目延伸丝绸文创产业链。

县域发展层面：北部湾经济区重点培育跨境电商、临港物流、绿色制造创业集群，实现南宁、北海、钦州等市县创业资源共享；西江经济带地区鼓励配套创业项目向周边县域转移，发展制造主导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创业项目。例如，桂林周边县域的生态研学、梧州骑楼文化创业；桂西资源富集区打造资源型创业＋生态保护模式，建设百色芒果、河池桑蚕、崇左蔗糖等特色创业园区；开发生态旅游＋创业项目。

参考文献

[1] 叶振宇.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升级与路径突破[J]. 人民论坛，2024(18)：25-30.

[2] HALTIWANGER J，JARMIN R S，MIRANDA J. Who creates jobs? small versus large versus young[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s，2013，95(2)：347-361.

[3] 薛慧丽，王珊珊，张光利. 城市群政策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65(2)：193-206.

[4] 潘丹丹. 创业、风险投资与县域产业结构[J]. 现代经济探讨，2025(5)：80-90.

[5] 林嵩，谷承应，斯晓夫，等. 县域创业活动、农民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2023，58(3)：40-58.

[6] 邓金钱，刘明霞. 数字普惠金融对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县域层面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4，39(6)：94-104.

[7] 徐鲲，贾俊伟，张皓月，等. 创业成本感知对创业意愿影响的组态效应研究[J]. 科研管理，2023，44(12)：136-145.

[8] 郑金辉，陈海娜，徐维祥，等. 数字金融、创新创业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规模与质量视角的分析[J]. 统计与决策，2024，40(3)：145-150.

[9]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n inquiry into profits，capital，credit，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M]. New Brunswick，London：Transaction Publishers，1934.

[10] ACS Z J，AUDRETSCH D B，LEHMANN E E.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13，41(4)：757-774.

[11] NAMINSE Y E，ZHUANG J，ZHU F. The rel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rural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J]. Management Decision，2019，57 (9)：2593-2611.

[12] DAGESTANI A A，QING L，ABOU HOURAN M. What remains unsolved in sub-African environmental exposure information disclosure：a review[J]. Journal of Risk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2022，15(10)：487.

[13] AUDRETSCH D，DOHSE D，NIEBUHR A.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ntrepreneurship：a regional analysis for Germany[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10，45(1)：55-85.

[14] 张玉利，冯潇，田莉. 大型企业数字创新驱动的创业：实践创新与理论挑战[J]. 科研管理，2022，43(5)：1-10.

[15] 武前波，许璐艺，崔万珍. 数字创业驱动下城市空间重构特征与发展趋势[J]. 城市规划，2025，49(9)：13-22.

[16] 李贵成. 返乡农民工绿色创业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 中州学刊，2020(6)：88-94.

[17] 张学良，周泽林，汤新云. 推动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个理论问题[J]. 财贸研究，2023，34(6)：1-8.

[18] 魏滨辉，罗明忠，曾春影. 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线索与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23(10)：26-48.

[19] 邹欣. 什么样的创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评论，2018(3)：3-12.

[20] 王勇，张耀辉. 创业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 经济问题，2022(2)：69-78.

[21] 高静，李丹，陈峰. 乡村创新创业推动县域经济增长：理论逻辑和实证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1)：79-93.

[22] 王修华，欧阳佳俊，刘锦华. 资本市场服务下沉何以支持县域经济增长——来自“资本市场县域工程”政策的经验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2025(6)：101-121.

[23] 白俊红，张艺璇，卞元超. 创新驱动政策是否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2022(6)：61-78.

[24] 黄祖辉，宋文豪，叶春辉，等. 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J]. 中国农村经济，2022(1)：24-43.

[25] 董旭，许高阳，薛桂芝.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经济增长吗？——来自中国县域层面的经验证据[J]. 南开经济研究，2024(11)：66-85.

[26] 陈钰莹. 农村产业融合、县域创业活动与农民增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4，46(5)：73-83.

[27] 温忠麟，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28] 姚利好，易法敏，孙煜程. 农村电商、数字普惠金融协同促进县域经济增长[J]. 财经问题研究，2022(11)：67-76.

[29] 高名姿,张雷,朱慧劼. 数字治理、宗族网络与农业创业——基于东部地区397个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2):173-184.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ounty-level Data from Guangxi

ZHAO Yu, YANG Yuxi

(School of Business,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s a vital driving force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order and ethnic minority areas. However, the driving mechanism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relatively backward regions still need in-depth research. Based on this, taking the data of 85 counties in Guangxi from 2014 to 2022 as samples,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mediary mechanism was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nties in Guangxi,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robustness tests and endogeneity treatments.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plays an important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two. In addition, the entrepreneurial effect ha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its promoting effect on counties in the Beibu Gulf Economic Zone is more significant.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government support, entrepreneurial subjects and county development,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counties, 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county-level econom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conomic development